

访谈

许田波
苏利利

中国民主季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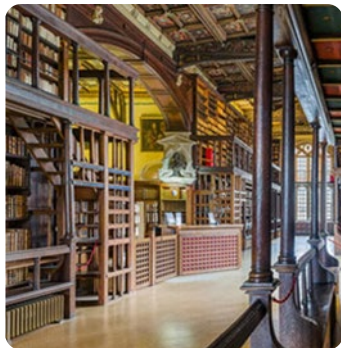
第 2 卷 第 3 期
2024 年 7 月
CC-BY-NC-ND

自由、免费转载分发，但须注明
作者与出处，并不得修改及商用

20 年坚持： 香港的抗争 与镇压



许田波



苏利利

编按：从北京的接管到香港自由的丧失，近30年，香港人为守护自己的自由和争取民主，进行了一次次举世瞩目的抗争。那些抗争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如何评价那些抗争，包括它们的成效与战略？抗争最终并没有守护住香港的自由，原因是什么？受《中国民主季刊》委托，社区参与研究者苏利利女士对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许田波 (Victoria Hui) 教授进行了以下访谈。许教授长期讲授世界各地的非暴力和暴力运动。

苏利利（以下简称苏）：许教授，很高兴您接受我的采访。我们先从背景开始。可否请您概述下《基本法》及其制定过程？

许田波（以下简称许）：关于《基本法》的具体细节，我建议您参考戴大卫 (Michael C. Davis) 的书《自由的废黜》 (Freedom Undone)，我认为他的书会对大家更有帮助，而且我想《中国民主季刊》也在讨论这个话题。

但我想补充一点：许多人以为香港人天真地接受了《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但事实是，香港人在谈判桌上没有席位，甚至没有被征求意见。声明公布时，香港的精英们持怀疑态度。行政局成员访问伦敦时被冷落。我仍然记得当时香港议员刘慧卿呼吁港人保持清醒，说香港人被英国背叛了，这让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非常恼火。刘慧卿当时在《远东经济评论》工作，她向撒切尔夫人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却被严厉斥责。最终，香港人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英联合声明》，并寄希望于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

那个时候，也是中国领导人实行改革开放的年代。是北京掌权的人，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他们的改革举措让人们感到振奋，大家认为中国将会发生真正的根本性变化。

但即便在早期，已经有迹象表明北京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因此，无论中国领导人怎样劝告香港人放心，香港不断壮大的亲民主阵营对承诺能否兑现持怀疑态度，除非香港发展出真正的民主。早在1988年就有港人呼吁举行直接选举，但北京向伦敦施压，拒绝了这一要求。

1988年，港府进行了全城民意调查，以评估对直选的要求。问卷调查中设计了一些引导性问题，试图制造港人并没有强烈直选愿望的假象。我的新闻学教授在课堂上痛批这次调查。他是最温和的教授。他的愤怒也让全班同学大为震惊。

决定香港命运的是天安门六四事件。《中英联合声明》规定，北京必须通过国家法律来落实承诺。北京确实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

中容纳了香港不同的声音，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两位香港民主倡导者李柱铭和司徒华。六四事件后，北京将香港视为“颠覆基地”，重新评估其香港政策。1990年颁布的《基本法》增加了第23条国家安全立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当时，李柱铭主张修订这些条款，认为它们从根本上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正如后来的事件所表明，北京的确将这些受六四事件影响的条款用作为武器。

《基本法》确实规定了逐步迈向2007/08年普选的一些步骤。就当时的状况来说，如果能兑现已经打了折扣的《基本法》所做的全部承诺，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香港在主权移交后10年中继续没有话语权，只能等待。港人的态度就好像是，“好吧，我们可以将就。”

基本法的规定造成了对2007或08年后实施民主化的预期。2003年香港市民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他们将注意力转向了第45条所承诺的“普选”。全国人大常委会随后决定将改革推迟到2017/18年之后。

香港人非常“乖”，又等了十年。正是考虑到2017/18年要临近了，戴耀廷在2014年发起了“用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向政府施压、要求开始讨论和规划。北京没有按照《基本法》的承诺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反而在2014年6月发布白皮书，主张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北京同意在行政长官选举中实施“一人一票”模式，但仅允许预先批准的候选人参选。北京的这些决定直接引发了以“我要真普选”为口号的“雨伞运动”。

香港人1997年以后，一直通过和平抗议表达他们的声音。尽管如此，大

家都表现得很顺从。前 10 年，政府要求我们耐心等待，逐步推进，我们遵从其要求。10 年过后，当政府告知这些步骤将被冻结另一个 10 年时，我们依旧等待。但 2014 年实施的严厉政策表明，北京从未打算履行普选的承诺。这正是抗议爆发的原因。

苏：为什么人们心中有不满，但仍然选择等待？您是否认为原因是人们仍然相信中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认真对待《基本法》？

许：从根本上说，如果北京不履行承诺，我们就别无选择。所以我不认为这是对中共的信任，更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好吧，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苏：从一开始，香港人就有点像今天在大陆的中国人，可能心里有抱怨，但他们不愿意真正上街抗议，可能是风险太大吧。我的一个上司在 1997 年以前就移民了，他告诉我说，香港的前景会很惨，甚至比不过上海。

许：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怀疑是否具有可比性。香港人明白，北京不可能屈服于民众的压力，但他们坚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 2019 年之前，参加抗议活动至少不会有风险。因为当时参加抗议，从某种程度上讲，更像是一种令人开心的活动。你和朋友去抗议，然后一起吃饭，回家后觉得自己做了一点有意义的事。

在 2020 年国家安全和 2024 年第 23 条立法之后，我想现在是非常愤怒的时候，但同时，人们已经不敢发声了。或者，如果他们无法忍受，就会选择离开。所以现在，他们的所想所为就有点像在大陆的中国人。但很长一段时间，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得说，人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的结局。

您的那位上司可能是更有预见性的人。我还是引述一段我在 2019 年末的话：“北京不会希望完全扼杀香港的制度，因为，很多人和我一样，难以想象中中共会做得那么过分，直至完全扼杀香港。”

到了 2022 年习近平实施清零政策扼杀上海，那时我终于明白，习近平是不惜完全扼杀生蛋的鹅的，不论是上海还是香港。

在 1997 年以前，我们对香港的制度有信心，也相信扼杀香港并不符合北京的利益。但我们实际上很容易被击垮。我觉得，当时许多人认为香港的自由、制度和法治体系都是相当坚固和完善的，不像许多其他地方那样是新兴的民主体。我认为，这反映了一种信心，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实的接受。

苏：另外，关于香港的两次年度抗议活动，一个是由香港支联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组织的维园六四大屠杀周年纪念晚会，另一个是在 2003 年后，由约 50 个组织联合而成的“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 CHRF）组织的七一大游行。我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且成熟的平台，所以我想回到 1989 年的事情。请问在这两天之外，他们还做了什么？

许：港支联成立于 1989 年，并一直延续下来，同样一批人成立了“香港民主同盟”（1994 年改组为民主党）。我在 1991 年至 1994 年间曾与他们一起工作。他们当时的困惑就像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面对天安门大屠杀，我们要从中国要求普选，从英国要求护照，而北京政府已经

和我们摊牌了，这使我们需要组建自己的政党来争取民主。”

过去数十年所有的运动都面临着同一个困扰：一旦你被认为是“建制化”(established)了，人们就不再喜欢你了。民主党组织游行、抗议、唱歌，点点蜡烛，然后回家，受到批评，被认为毫无所成。所以，这些质疑 --- 即虽然平台很好，但所做的事情不多 --- 在当时就已经存在了。

但到 2003 年，有一群律师出来，他们带着彩虹小册子，动员大家的支持，这其中吴蔼仪和余若薇。2003 年之前，参加抗议的人数一直在下降，甚至都下降到惨不忍睹的程度了。但到 2003 年，一下子有 50 万的人上街，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和新面孔，这标志着运动进入到了新阶段。原来的第 23 条关注组转而也关注了第 45 条，随后，公民党诞生了。

公民党得到了很多议席，与此同时，它还和民主党保持良好的关系。然而，仅仅几年后，公民党也被认为是过时了。于是，总能看到另一些激进的人士公开表态：“你们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情况一直就是这样的。

不过你关于民阵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您还提到了一年两次的抗议。公平地讲，人们，尤其是那些仅在 2019 年才开始参与抗议的年轻人，他们只看到了人们在这两天参加抗议，然后去吃饭，第二天就回去挣钱或教书。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这两天的抗议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用了全年的时间去开会、互相帮助、传播信息、组织培训活动，并保持社会联系。

基本上，所有的公民社会团体都会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例如，选定当年的主题，并商定如何实施，包括协调工作以及各自的职责分工等。期间，

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大学生，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他们或多或少地通过这样的渠道变成了活动家。此外，还有很多的社会工作者和其他人，基本上都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到社会活动领域，而最终汇聚到民阵的平台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香港的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协作的结果。那个时候，政府也明白，当他们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时，可以提供更高效的政策。像王惠芬以及很多其他社工群体所形容的那样，民间社会组织提出了要求，政府也做出了回应，尽管往往是姗姗来迟，勉强为之。甚至是香港众志（Demosisto）的成员也会说，“当我们和政府官员开会时，他们对我们非常友好，给我们提建议，还会招待我们。”所以，这确实是一个真正高质量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自上而下的改变非常容易发生：一旦上层发布命令，没人敢违命。现在，政府想要扼杀公民社会。如果你不签署效忠《基本法》的誓言，他们肯定会采取措施。

苏：确实如此。如果我们将 2012 年和 2019 年的抗议相比，2012 年的抗议还是相当成功的，“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给的评分是 7/10。现在如果我们谈到学生或者年轻人的抗议，我觉得他们与老一辈的抗议非常不同。老一辈的抗议总是很常规性的。年轻人有非常明确的诉求。

许：我不能确定是否可以这样区分。在争取普选上，目标从 1988 年以来一直是明确的老一辈人被认为太过于“建制化”，他们是有成就的专业人士。

后来，学生们走上了抗议的前线。他们最早是抗议高铁，因为高铁的建设需要走直线，会摧毁沿途的所有村庄。学生们在 2009 年开始抗议，很多学生在放学后穿着校服参加抗议。反高铁抗议培育了一代中学生前线抗争者，其中许多人后来在 2012 年加入了黄之锋、周庭和罗冠聪等人的行列，成立学民思潮，然后又改组为香港众志。

然而，有意思的是，到 2019 年，连香港众志也被认为是过时了。黄之锋在 6 月 17 日出狱，前一天的 6 月 16 日，200 万人抗议“送中”法案。一周前的 6 月 9 日，一百万人上街游行。但黄在出狱后并没有声称自己是这些抗议活动的领导者，而是保持沉默。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与 2014 年有关。

为什么 2019 年的运动没有领导者？因为大家吸取了 2014 年的教训。2014 年的运动有领导者，特别是“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师，还有香港专上学生联合会（HKFS）和中学学生的学民思潮，但人们不喜欢他们坚持和平抗争。

因此，早在 2014 年，“和平抗议无用”的思潮已经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占中运动的失败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权力（领导）撤离”。当时，他们希望通过民调决定是继续留守还是撤离，但计划被阻止。由于没有足够的支持，他们不敢贸然行事。因此，在僵持阶段，学生领袖们宣布要冲击政府大楼，这是在激进派的强大压力下采取的行动，结果挨打。

香港支联会的首要目标可以概括成两个词：“平反六四”和“民主中国”。当涉及香港时，它始终强调“我们需要民主来保护香港的自由”。

香港民主运动曾经有几次小胜。但如我在 2020 年的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JOD) 文章中所提出的：每次我们取得胜利，例如，2003 年的 50 万人游行令政府搁置 23 条立法，我们以为我们赢了，而实际上，这些只是战斗中的局部胜利。2012 年，政府搁置了国民教育科（简称国教），我们庆祝“取得了胜利”，但这也只是局部胜利。

2003 年后，北京利用当时新成立的联络处设立了第二政府，或者说是第二个炉灶或影子政府来监督香港政府。2012 年之后，实际上北京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这时开始加快了“国教”（德育及国民教育课）的步伐，侵蚀了香港的自治。他们的做法就是，“你们不想要特定的国民教育课程？”没关系，他们实际上通过历史、中文等其他学科来推行国教。所以，基本上整套内容被分解成了不同的部分，化整为零，现在它们又重新聚合在一起了。

因此，每一次的胜利其实是特定战场上的局部胜利。而最终，北京下决心要彻底击倒一切。

苏：是的。当谈论战略时，我们找到一个能指导所有战场的战略。然而，当回顾香港的运动时，虽然有明确的战场和最终目标，但缺乏实现最终胜利的方法与计划。抗争者们确实没有一个长期计划，但至少如果你想成为领导人民走向最终胜利的领导者，你必须从做计划开始。学生们可能在心里意识到，他们的诉求不会实现，所以从采取行动开始。

许：我长期讲授全球范围的自由斗争。成功与失败并不是因为有还是没有长期战略。香港人的长期计划很明显：落实基本法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当然，您可以指出 2019 年暴力的转变或缺乏整体成功策略。但是，成功的不在于战略，而在于是否独裁者在过程中悄悄地因为害怕而退缩了。

在我的教学中，我总是喜欢先讲乌克兰，然后再讲香港。在乌克兰，2004 年成功的“橙色革命”后来失败了，导致亚努科维奇在随后的选举中获胜。乌克兰人在 2014 年的欧洲广场抗议活动中再次反对同一位专制者。无论我们在 2019 年发现香港存在什么问题，乌克兰的经历都可以拿来对照整个问题清单。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夏天，《凛冬烈火》纪录片曾在香港放映¹。这个纪录片讲述了乌克兰警察不仅向抗议者开枪，还向急救人员开枪；抗议者愿意为乌克兰的未来牺牲；年轻抗议者拒绝传统反对派领袖；甚至一个 12 岁的孩子学会制作汽油弹投向警察等内容。

香港的斗争在一个关键方面更加艰难：香港人不是在与自己的政府对抗，而是在与香港之外的政权力量对抗。六四事件之后，北京将香港定性为反共基地，从来没有放手让香港落实高度自治。2003 年和 2012 年有“胜利”，因为北京允许香港官员自主暂停政策。北京在 2014 年和 2019 年不再允许这样做。从这个角度来看，说香港泛民主派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是错误的。

看看今天的乌克兰，它的胜利是什么？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似乎不现实。实际上，胜利可能就是保持防线。

所以，我会争辩说，民主派长期以来未被充分认识到的是，如果他们基本上不给你前进的空间，那么就尽可能长时间地去坚守。因此，如果他

们能够团结一致保持防线的話，即使最终防线会被推倒，但他们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就是我所说的，香港 30 年的民主运动实际上是在努力保持防线。北京原计划在 2003 年就实施国家安全法，但民主运动成功地坚守防线长达 20 年。实际上，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

苏：您认为坚持 20 年本身已经是一种胜利，对吗？

许：这只是我们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这就好比是乌克兰人，他们也不愿意失去领土，但他们能守住阵地，也算作一种胜利。自 2019 年以来，香港人基本上被彻底击溃了，仿佛一排看不见的坦克碾过了一切。

苏：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您认为香港人是否能找到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许：我的解释是：已经无法做得更好了。抗议的强度确实引发了更严厉的镇压，但镇压无论如何都会到来。2019 年时，问题在于我们发出了挑战：如果我们要倒下，就像口号所说的那样，“我们将崩溃，我们已经无法再抵挡了。”但如果我们要倒下时，我们希望全世界知道我们并不是没有抵抗就屈服了。

如果可以重新书写历史，我会将责任指向英国政府，特别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他们在 1972 年把香港从殖民地名单中移除，而殖民地本应拥有对未来自决的权利。到中英谈判时，英国政府没有考虑香港人对自身前途的意见，没有在协议中包括足够的保护执行机制，这意味着如果北京方面未能履行协议，伦敦无法将北京告上国际法庭。同时英国政府拒绝给

予香港人英国护照。如果当时给予香港人英国护照，至少他们还有撤退的选项，这样北京可能会更加谨慎地行事。我认为这是唯一的方法。

苏：所以，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教训是，不能总指望任何西方政府。让我们回到 2019 年，您认为当年的运动为什么会面临如此严厉的镇压？

许：先回应关于西方政府的观点，我认为您说得很对，每一个民主政体都必须源自其人民自身。这并不是说我作为香港民主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在美国国会工作，但其实这种努力效用极为有限，象征性多于实质效果。

真正能帮助港人的是人道主义移民。当时这一话题引发了广泛讨论，但最终本应在参议院快速通过的法案被泰德·克鲁兹（Ted Cruz）阻止了。他表示担心香港人中会有中国间谍，因此反对给予香港人特别移民身份。有被捕风险的也只能与其他国家的人一样排长队等待庇护，而那意味着需要等待很多年。我所知道的案例中，除了一个人在六个月内获得庇护，大多数人早在 2019-20 年就进入美国，但至今仍未得到任何消息。这是政府方面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在美国流亡的其他国家的前反对派领导人形成一种民主联盟，因为独裁者共享他们的监视技术和警察培训等。而反过来对于我们来说，国际合作同样是必要的，但实际上这方面资源有限。

如果要依赖法国和德国、英国和美国的支持，这不仅是不可靠的，还被认为是与“境外势力”勾连。这正是《国家安全法》的目标：切断与外国联系的任何形式的。

然而，联合国仍然是一条可行之路。实际上，《中英联合声明》是向联合国提交的，中国是自愿签署的。中国最担心的是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布的关于新疆的报告，北京当时动用了巨大的关系网以压制这份报告，确保报告不过于尖锐。北京确实希望从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家获取合法性的认可。

苏：当我们是学生的时候，实际上政府对我们没有那么严厉。²

许：这就像当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警察把靴子踩在人们的脸上和脖子上的场景每天都在发生。抗议者从《凛冬烈火》、从乌克兰的反对派学到了很多。同时，香港警察也从乌克兰学到了很多新的战术。在乌克兰，他们专门针对急救人员和急救站。他们瞄准人的眼睛和头部，试图最大限度地造成伤害。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有人被击中倒下，而另一个人试图救助他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在香港也发生了。

为什么警察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手法来阻止抗议活动。尽管警方会使用威胁，但这些抗议者无所畏惧。如果逮捕他们，这些抗议者被释放后还会再回到街头去抗议。所以，警察选择伤害他们，以瘫痪整个运动。

为什么？显然，他们一方面试图伤害他们，还有一个原因是警察可以去医院逮捕人。情况的严重程度使得急救人员不仅要担心自己的安全，还要担心如何照顾受伤的抗议者。一个著名的案例是一名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从购物中心跳下，救护车想带他去医院救治，却被延误了一个多小时，导致他最终不治身亡。

这正是警察的目的：希望抗议者死去，或者受重伤无法继续参与运动。基本上，这是通过伤害抗议者来瓦解整个运动的策略。

苏：所以实际上警察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吓阻他人，对吗？

许：是的，为了吓阻其他人，但同时也是为了把那些无法被吓阻的人打残，使他们无法再回到抗议中去。

还有一个要点是，如果我们从国际非暴力中心（ICNC）学到什么的话，那该是让镇压起到反作用（激起更多人反抗）。然而，北京从 ICNC 和吉恩·夏普（Gene Sharp）那里也学到了所有这些内容。北京的策略是：如果暴力镇压反而让人们相信非暴力抗争会失败，那就太好了。

所以，警察明知道在每个抗议现场都有许多人在拍摄他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众新闻》都在现场，《纽约时报》甚至有 30 人在香港，在每一次警察滥用暴力的过程中，他们都被拍摄和现场直播。

可为什么警察还是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想通过暴力手段挑起反对派的暴力行为。

苏：所以这是（警方）针对街头抗议者所做的反应。³

许：是的，他们让自己的暴力行为对抗议者起反作用。警察想要吓阻，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去逮捕人。抗争还可以用其他方法，警察不知道如何应对非暴力抵制和罢工，或者只是唱歌的抗议形式。

苏：就如何进行抗议，我记得您提到过，仅仅抗议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进行罢工、抵制等活动。这一策略也被称为“去中心化策略”。然而，在2019年，人们也尝试过发起大罢工，但并不成功。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许：回想起来，8月5日那次大规模总罢工，很多国泰航空机组的飞行员和工作人员都参与了罢工。几周之后，国泰航空就被接管了：首席执行官(CEO)辞职。每一个员工都被叫到经理办公室：“这是你的Facebook页面吗？你发了……”。如果他们在网上发布了支持抗议活动的内容，他们将被解雇。这次事件彻底改变了局面。人们为了保住工作，变得非常谨慎。

为什么年轻人在2019年11月占领中文大学？因为他们明白这些大学恰好位于交通主干道旁边，他们想要阻断交通。他们曾尝试在地铁站呼吁“三罢”，⁴但被人们无视。

另外，南非的案例表明罢工和抵制不一定起作用，因为如果只是告诉人们去罢工，虽然这是去中心化的策略，使人们不那么容易被捕或被打，但他们会失去工作，尤其是那些高薪且高度专业化的员工，一旦失去工作，他们很难找到另一份同等职位的工作。因此，人们从中吸取了教训。

1980年代南非的乡镇消费者抵制运动最终奏效，⁵因为他们准备得非常充分。他们囤积了足够四个月的供应，以便能够告诉人们不要去白人区的商店买东西。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日常必需品储备，也无法购买它们，那罢工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你将无法维持很长时间的正常生活。人们需

要回去工作，回到他们的生活中。因此，充分的准备和组织是关键。我们需要更加有组织性，但政府会逮捕所有的组织者。

大家还学到了另一课：最有效的非暴力抗议方式实际上是选票。所以，人们在 2019 年 11 月 24 日行使了投票权，并且大获全胜。那年年底，前线抗争者要么被逮捕，要么受伤严重，导致他们都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温和派重新回到了舞台上，并赢得了选举。

在 2019 年末到 2020 年初，约有 4000 个新工会成立了，人们意识到，为了使未来的罢工更加有效，那就需要有更多的组织。所以，医护人员走到了一起，他们已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会。他们聚集在一起，投票决定就新冠疫情进行罢工抗议。这次抗议的焦点不是关于民主，而是关于新冠，要求香港政府关闭边境。他们请病假参加罢工，受到了处罚；但由于香港严重缺乏医疗人员，所以他们没有被真正解雇，只是受到了惩罚。

苏：好的，今天的讨论非常好。谢谢你。

许：是的，非常感谢，利利。

注释

- 1 《凛冬烈火：乌克兰为自由而战》（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是一部 2015 年的纪录片，由叶夫根尼·艾菲尼夫斯基（Evgeny Afineevsky）执导，纪录了乌克兰在 2013 年至 2014 年冬季爆发的亲欧盟示威运动。
- 2 这里指的是 1989 年发生在中国的抗议，1989 年的抗议是全国性的，并不只是北京，问题是，北京的抗议是唯一被报道和被今天的人知道的，所以，今天很多人对当年的历史事实有误解，当局对抗议学生领袖的对待也不是全国统一的。
- 3 这里指的是关于“镇压的反作用”的策略。

- 4 “三罢”指罢工、罢课及罢市。
- 5 1980年代的城镇消费抵制运动（Township Consumer Boycotts during the 1980s），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一部分，该运动没有正式名称。